

中国如何追赶美国

□胡鞍钢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继续追赶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指标方面的发展差距。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美国，这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最发达的也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构成 21 世纪中国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令人关注的重大事件。那么在 21 世纪中国能否追赶美国？如果能够的话，追赶美国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如何追赶美国？在哪些方面是我们追赶美国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第一，中国将明显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麦迪森 (Angus Maddison)(1998)按实际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1978 年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 23.0% 到 1995 年上升为 52.0%，2000 年为 60.6% 进而在 2015 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那时中国人均 GDP 仍然大大低于美国，中国人均 GDP 由 1995 年相当于美国的 1/10 上升为 2015 年的 1/5 因而缩小与美国人均 GDP 的差距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第二，中国将应优先缩小在人类发展指标 (HDI) 方面的相对差

距，这包括人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 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参与权。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统计，1975 年中国 HDI 指标相当于美国 HDI 指标水平的 60.2% 到 1997 年上升为 75% 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和北京已相当于美国 HDI 水平的 90% 以上。这表明中国与美国在人类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要明显地小于在人均 GDP 水平之间的差距，因而中国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应优先缩小与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人类发展差距。我们估计到下个世纪 2020—2030 年中国的 HDI 指标应达到美国 HDI 指标水平的 90% 以上，人均预期寿命由目前的 71 岁提高到 75—77 岁 (1994 年高收入国家为 77 岁，1997 年美国为 76.7 岁)，成人识字率由目前的 83% 提高到 95% 以上 (目前发达国家为 95% 以上 美国为 99.0%)，15 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由目前的 6 年提高到 10 年 (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为 10 年 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已接近 10 年)。到那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5—16 亿人，即在人均中等收入水平条件下以及人均能源消耗量相对较低 (目前中

国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仅为美国人均量的 8.9% 的条件下,享有更高的物质生活质量,更全面的人类发展,更有保障的人类安全,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并进一步消除绝对贫困人口,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中国应重点缩小与美国在知识、教育、信息方面的差距,这有助于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人类发展差距。过去 20 年是中国在主要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过程,例如谷物、肉类、水产品、水果、煤炭、钢、化肥等产量都不同程度地高于美国,在电力生产和汽车产量方面还明显地低于美国。中国与美国在知识与信息方面的差距十分悬殊,中国 SCI (指国际科学索引) 数相当于美国的 45%;中国居民专利申请数不足美国 8%;K&D 支出为美国总数的 13.1%;高技术出口额为美国总数的 3.5%。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十分低下,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电话主线仅相当于美国的 61.8%;移动电话相当于美国的 42%;个人电脑为 3.8%;因特网用户为 4.6%;电子商务交易额仅为美国的 0.23%。中国成人识字率比美国低 16.1 个百分点,中国综合入学率比美国低 30 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差距既小于人均 GDP 差距,也小于科技差距和信息差距。21 世纪中国追赶美国的战

略实质是知识促进发展战略,首先是扩大中国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特别是获取美国的知识与技术,提高中国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能力。其次是扩大广大公民吸取知识的能力,普及全民 9 年义务教育,积极推进 12 年中等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远程教育;再有扩大广大公民传播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至少使城市电话、移动电话、因特网、电脑普及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指标方面,我们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距,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缩小与美国的三大差距(知识差距、教育差距、信息差距)需要调整政府投资方向,从竞争性投资转向非竞争性投资,从硬件投资转向软件投资。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为 42%,大大高于美国 18% 的水平,但大部分属于硬件(厂房与设备)投资,而软件(指 R&D、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机构等)投资占 GDP 比重明显偏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未来几十年中国政府需要大幅度提高对软件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例如:教育投资、R&D 投资、卫生医疗与全民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投资、计划生育与人类生殖健康的投资等。

第四,中国需要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并作为长期发展扩大国内投资需求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国土面积大

于美国国土的面积，但是铺设公路里程只有美国总数的 7.3% 铁路里程为 27.4% 输油管道为 3.5%，输气管道为 2.8%；中国仅相当于美国航空运输市场的 9.1% 登记的汽车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5.3%。今后 20 年应当是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黄金时期”这包括加速发展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航道与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业，从而构成未来中国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设备的进口需求。

第五，中国需要加速服务社会化进程，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把服务业作为未来新增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服务业占就业总数比重不足 30%，而美国这一比重高达 70% 以上，其中美国女性劳动力占服务业比重为 84% 而中国女性比重只有 11%；1997 年美国金融保险及不动产就业人数相当于中国同一行业人数的 3.7 倍；美国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业就业人数相当于中国 1.5 倍；虽然中国的人文历史十分悠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 1998 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仅相当于美国总数的 17%；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美国，但是股票市值仅相当于美国的 9%。

发展服务业的主要思路，是打破少数国有经济部门的长期垄断，取消高度保护 引入竞争机制 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我们把它称

之为政府的政策投入，而不是投资投入。

第六，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城市化率水平的差距。未来 50 年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 32% 美国高达 70%。如果中国城市化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如果中国城市化率提高 20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个美国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这不仅创造巨大的私人消费需求，而且创造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消费需求 即使到 2020 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 50%，仍然低于那时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21 世纪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追赶美国，并不是以美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这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国情差异甚大，也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通过中美两国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两国现代化指标的差异性，又可以寻找缩小两国现代化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例如积极引进技术发明国的技术和装备，而引进技术成本又大大低于技术创新成本，有可能直接采用国际最新适用性技术，并跨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当前，世界已进入了知识爆炸性增长和迅速扩散的时代，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与信息、利用知识与信息、传播知识与信

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知识与信息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改革要素。当今世界，一国或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上的优势不再是永远的优势，而知识以及提高自己的知识潜力，即动态比较优势才是发展的关键，这使得中国有着极大的机遇发展得更快些，进一步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断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发展差距。

知识促进发展是 21 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其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知识发展，投资于人民，投资于知识，旨在优先缩小两大类知识差距，一是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

距，二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着眼于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传播知识、利用知识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一项战略性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突破、关键性技术发明、科学知识的普及，都会比小国产生出巨大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为此，中国 21 世纪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实质是加速知识与技术追赶过程。这一过程还有赖于经济开放程度大小，开放程度越大，吸收外部知识与技术能力就愈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愈明显，进而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愈强，追赶的进程就越快。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将成为全球 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

美国波音飞机集团副总裁总兰迪·贝斯勒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进入 21 世纪，中国航空运输业将继续高速发展，国内航空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将超过 9%。未来 20 年内，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

贝斯勒说，波音公司预测，未来 20 年，世界航空客运年增长率为 4.8%，货运为 6.4%，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到 2019 年，中国将拥有 2200 多架客机，占全球机队的 10% 以上，机队

规模是现在的 4 倍，将新增飞机 1790 架。未来 20 年内，中国民用喷气飞机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1370 亿美元。据了解，目前中国共有 499 架喷气机，其中 348 架是波音飞机，波音飞机占中国民机市场份额的 70%。

贝斯勒指出，西部大开发将促进中国西部航空业的发展，地方机场将拥有更多航线和更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空运网的成熟，地方机场将利用小型飞机占据更大的航线百分比。小型单通道支线客机将成为未来中国航空市场的主要机型。

（摘自《光明日报》）

首份有关中国私企的国际调查报告 私营经济降低中国改革成本

□ 陈铁源

最近，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集团所属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作出了一个调研报告——《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据说这是“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国际性调查报告”。该报告是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郜若素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及其带领的考察小组，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协助下完成的。考察组就中国私营企业的结构、私营企业所处环境及其融资机会等三大方面，在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四大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

调研活动历时 16 个月，有 338 家私企的总裁接受了采访。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有以下 3 点：

第一，中国私营企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结果；第二，私营企业在产值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改善融资环境是私营企业面临的关键挑战。

报告认为，中国新兴私营企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1978 年至 1983 年是中国私企的复出阶段。当时私营部门仅局限在“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户的范围”，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让私营部门扮演“边际

的、填补空缺的角色”。

1984 年至 1992 年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阶段；1993 年至今是中国整体改革思路和官方对私营部门转变看法的时期。比如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产权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等至关重要的有关私营企业的新说法，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IFC 的报告显示，私营部门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截至 1997 年，私营部门的员工总数达到了 6790 万人。截至 1999 年 6 月，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达 130 万家，注册资本总额达 8177 亿元。

IFC 东亚和太平洋局局长说：“私营部门在刚出现时，只被允许在（中国经济的边缘上运行，而现在它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并被官方确定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成果。”私营经济为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拓展了非常重要的渠道，并成为国有企业艰难改革的催化剂，进而大大减轻了中国总体改革的社会成本。

让暴富阶层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

□杨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收入分配有几个方面：

第一，单位正式收入。包括工资、奖励、奖金又包括货币和实物两种。

第二，单位福利。一部分是单位所负责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住房和公费医疗，其他如汽车、微机、手机、旅游、出国、培训等等。随着各单位收入差距拉开，这部分收入相差越来越悬殊，当然这些主要是为单位领导人支配和享用。如果是权力单位利用权力得到的，就具有灰色收入性质。

第三，第二职业。个人单位之外的兼职所得。

第四，灰色收入。指那些法律规定不清，难以区分其合法性的收入。比如在商业、采购、广告、贷款、报道、发稿、评审等活动中，凡是有“审批权”的地方，都有为了得到批准，或者为了尽快得到批准，得到有

利于自己的政策，而广泛进行的“寻租”活动。其手法灵活多样，除传统的回扣和请客送礼外，早已经变本加厉，如邀请出国考察，安排子女亲属出国留学或者到关键单位关键岗位等等。

第五，实际消费。如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一个人住一个楼是普遍的事，在行政开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余各项如在执行公务、出国、调查研究、检查评比中的实际开销、超标住房等，数额应该比货币形态更为巨大。

上述的收入和实际享受究竟有多少，虽然我们难以统计，但这并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可以不研究。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的“模糊”又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所以才需要下功夫研究。

消费需求不足使人们发出越来越多疑问：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银行里不是有6万亿居民存款吗？

有专家指出，尽管中国在对待私营企业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其速度远远跟不上私营企业本身发展的速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本身也面临很多不利因素：

比如私营部门的经营很不规范，企业的实际经营与其名义上的要求明显不符等。因此，目前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的私企的活动一直都“比较低调”。

（摘自《青年参考》）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支出增加，老百姓有钱不愿花。人们进一步提问：老百姓究竟是有钱不消费，还是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中国的财富分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1998年8月份，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答记者问，解释对居民存款征收所得税一事时说，据我们估计，10%的居民占有66%的存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加上股票、房地产和外逃的2000亿美元，中国两极分化严重得惊人。

近年来许多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实是卖不出去的粮食和其他剩余的农产品库存的增加，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增加。

严重的是不同地区农村收入差别显著，沿海地区与内地农村人均收入差别达到80%。6亿农民在近12年可比货币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了7块钱，相当于沿海农民货币收入增长的1/50。半数以上农民收入下降，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

中国改革之所以难度增大，主要是因为1995年以来，农民收入下降和工人下岗，已经不符合经济学家称之为“帕累托最优”的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少数人暴富没有关系，只要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绝对下降。这实际是社会可以容忍的底线。底线被突破，说明我国必须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否则不仅有悖于社会

公正，而且也不会有效率一居民缺少购买力，企业如何赚钱？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改革成本不能再向居民转嫁。应该首先由国家财政承担下来，然后由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按照其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来承担。很明显，国家应该通过打击腐败，实行实名财产（存款、股票、房地产）制度，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让暴富阶层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

（摘自《中国信息报》）

国企将从146个行业撤出

国家统计局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在196个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应逐步从146个行业撤离，在35个行业保持一定控制，在15个行业中居于垄断地位。

该报告提出，应逐步撤离的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包括服装、纺织、食品、饮料业、日用品等行业。国有经济无须垄断经营，但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35个行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比较重要的自然产业如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二是关系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如航天、新材料、计算机技术、生物医药等；三是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的支柱产业，如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必须由国有经济垄断或以垄断为主的行业有15个，如军工、电力等。

（摘自《文汇报》钟欣文）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樊 纲

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

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所谓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

这种“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当然首先与用人体制相关。

其次，“以公权谋私利”之所以泛滥开来，显然与法制不健全有关。

但是，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就会发现，选人、监督与执法等反腐败的活动，都是有成本的，而不是可以“免费”获取的。就“监督与执法”而论，所涉及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过程所需的费用，维持立法与执法机构的费用，监督费用，调查案件的费用，公众个人举报揭发所需的时间与费用等等。当然反腐败也是有收益的，直接的收益是收回了“赃款赃物”，间接的收益首先是有利于消除“民愤”，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并因此而使经济得以更快地增长。

反腐败行为的另一间接收益是

它的“杀一儆百”效应。这是因为，对于搞腐败的人来说，也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搞腐败的收益自然就是贪污、受贿、收“好处费”等等以公权谋私利行为中所占的各种便宜，而“腐败的成本”则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第一，是被抓住后所受的处罚。腐败一旦被抓住后所受处罚越重，腐败的成本就越大。

第二，就是反腐败、反腐败制度的严肃程度。制度越严，为此而进行的宣传、监督、调查、追踪等行动越是频繁、越是认真、越是有效，腐败“被抓住的可能性”就越大，搞腐败时预期的成本损失就越大。

就是抓住腐败一定严惩，但是如果不去抓，或是因太多而“抓不过来”，或是大家司空见惯，谁也不抓，没有监督，没有调查，或是官官相护，有人举报也没人去抓，甚至举报的人反倒会受到惩罚，搞腐败的“被抓住”的可能性事实上等于 0 或近乎于 0，腐败的成本事实上也就还是等于 0 或近乎于 0。

可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腐败行为被抓住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问题在于“被抓住的可能

性”在理论上是一个“概率”这不仅取决于你监督了多少、抓了多少，还取决于在一定条件下有多少人“需要被监督”——理论概率，只是“受监督的人数”除以“有条件犯罪因此需要被监督的人数”而得出的一个比率。所以，要研究腐败的成本和防腐败的有效性，还要研究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这个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恰恰在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了一点。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产、供给与分配；“公共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决定”的事情，“计划分配”的事情太多，进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人数太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是一种使用“公共财产”的机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是一种“政府官员”，而且在一些问题是距钱和物“更近”的官员并且国有企业的职工，无论是售货员还是司机还是装电话的，也都是使用国家财产工作的人，也可能进行某种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如此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们进行监督与执法所遇的困难显然太大，防止腐败、消除腐败、“杜绝”腐败的成本显然很高通过有效的监督来保证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就很不容易做到，以至根本监

督不过来、抓不过来，一不留神就会弄到“法不责众”的地步。打个比方说，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也能凭借公权“开后门”，国有企业看仓库的也能凭借公权收贿赂，你得花多大人力物力才能“健全法制”？在一个有10倍的事情要由政府决定、10倍的物品要由政府分配、10倍的资金由政府官员掌握的经济社会中，“高薪养廉”所需的费用，“廉政公署”所需的规模，至少也要大10倍，才能换取一个同等的“廉洁程度”。即使我们假定一切反腐败的努力本身都是有净收益、净回报的，一个社会把那么多的资源配置在反腐败这个用途上，也是件很不经济的事情。

由此而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里，之所以腐败现象多，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多（本来就是这么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当然不是说已经健全了，而是说相对于要监督的对象的数目来说健全起来太难了）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清除腐败，根本的办法不是“严打”，也不是宣传教育（不是说这些完全不起作用）而是改一改体制。

700 万美元 公关大手笔背后

□秦 朔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但要克服偏见 要靠交往 而非隔离 要靠政府外交和经济外交 也要靠民间外交、文化外交、柔性外交 要加大公关力度推销国家形象 也要按照国际惯例不断完善自身。

近期中国在美国举行的一连串旨在推销国家形象的活动，代表着立足长远的外交思维的新变化。

“爱美心结”与“怨美情绪”

不到美国亲眼看一看的中国人，怎么也想像不到美国传媒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和现实的中国社会有着多么大的距离。虽然“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几乎每个美国商店都在销售，但大部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荒蛮之地，饱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控制”，人们没有信仰自由，妇女要缠足，知识产权没有保障，外国人没有安全感，盗窃美国核机密，一胎化限制，出口导弹，威胁台湾……所有这一切，和中国对美国普遍的正面评价与介绍，形成了鲜明对比。

几年前，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和几位中国牧师到美国一个小镇访问，并参加当地的祈祷会。

在多数人还“有私心”的现实条件下，消除“以公权谋私利”现象的根本办法，不是否定那个“私利”，也不是费劲巴拉地不使人们去“谋私

利”，而是尽可能地减少那个“公权”，以此来达到减少以至消除种种“以公权谋私利”行为的目的。

主人以非常隆重的方式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原因却是“你们终于逃出了中国”。不久前，华盛顿一家电视台的总裁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行李中带了大量方便食品，因为他非常担心在中国吃饭会发生困难。

差不多 230年前，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大洋彼岸那块土地，并在给它起的 100 多个名字中留下“美国”二字，取“美丽的国家”之意。然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水平、文化价值，又使得这两个同怀大国梦的国家，总也避免不了冲突。自称“上帝选民”的美国，老是想改变东方那个“共产国家”。其先进的生产力、科技教育、法治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确实带给后者以期待；但其居高临下、唯我独尊和傲慢的

（摘自《走进风险的世界》）

强权姿态，又不时挫伤着后者的自尊。中国的“怨美情绪”此消彼涨，永不可能烟消云散。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的，近年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现象，是“舆论状态和公众情绪受特殊势力影响或操纵，在国家对外政策中所起作用显著增大”。在对华关系上，这股特殊势力主要由“国会共和党多数、民主党自由派、军界头面人物、军事工业财团、控制大众传媒的集团等构成，并有兼事或专事反华鼓动的不少民间团体、学者、报人、前政府官员作为部分喉舌”。虽然美国行政当局往往愿意采纳较为理智的对华政策，但却不得不严重顾忌或屈从于该势力影响下的舆论情绪。

因此，要实现中美关系的真正改善和长治久安，在中国方面需要尽可能创造条件，“让美国的主流社会了解中国的社会主流”，逐步扭转中美间的“传播逆差”与“形象逆差”，这已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和使命。

柔性外交与文化热浪

今年8月，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从洛杉矶到华盛顿、纽约，与美国宗教界交流，接着参加联合国“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美国宗教界惊奇地得知，中国的宗教徒现在已有1亿多人，宗教场所8.5万多座，教职人员30多万，仅《圣经》就印发了2500万本。中国有很多年轻教徒

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不信神，但能够尊重孩子的选择。

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部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圣路易斯、印地安纳波利斯、洛杉矶、旧金山、圣荷西等美国主要城市举办了以“走进中国”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美国行”系列活动。通过展览（包括工艺品、时装、旅游资源）、文艺演出（如中央民族乐团和锦绣中华舞蹈团）和演讲（主讲人分别为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文化部长孙家正和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的方式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艺术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此次活动是中国近年来在美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400多位艺术家和演员云集美国，参展物品装了70个集装箱。“中华文化热”扑面而来，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兴趣。在展览所在地的纽约贾维茨中心，好几天的观众突破万人大关。有时场内表演已经开始，门外仍有二三百人在焦急排队。中央民族乐团到联合国总部演出时，有外交官吃惊地问：“这么精彩的演出，中国为什么以前没有在联合国的大舞台举办？”

从9月8日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开始在美国的多场演出。首场演出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门制作播出了30分钟的专题节目，引得许多美国市民致电、致信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及中国驻美使领馆，要求高价购票。

当得知无票时，又表示愿意出资落实场地，要求加演场次。

这一系列活动被美国传媒视为“中国对美柔性外交‘和’人性化姿态”的尝试，亦体现出中国在推销国家形象方面的若干新思维。

其一，柔性化姿态。不是硬梆梆的自我宣传，而是选准对方容易接受的传播入口，比如“文化外交”。中国工艺品巧夺天工，旅游资源引人入胜；传统服装秀“既有历史色彩，又有当代中国时装模特的秀美风采，残疾人演出更符合美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尊重心理。

其二，市场化手段。“中华文化美国行”聘请美国本土著名的公关公司帮助策划、包装，活动推广手段也非常市场化，如推出一条800免费咨询电话热线，中英文服务，提供所有活动内容介绍，包括怎样到达展览地点这样的细节（在曼哈顿街头的电话亭、美国广播公司在纽约时报广场的电视看板以及多家媒体播出活动广告。整个活动耗资700万美元（绝大部分由主办机构提供，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及多家美国大企业也提供了一些赞助）是一次大手笔的公关活动。

其三，多元化角度。有政府官员的演讲和答记者问，有社会团体的交流，也有民间组织的表演。美国是一个分权的社会，政府力量有限，很多重要力量在民间。民间角度的交流传播有时比政府外交更有效。

江主席成公关主角

在中国连串的对美公关活动中，其实最醒目的主角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9月3日，在他赴美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前一天，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著名的《60分钟》节目里播出了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接受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专访的录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均刊载了此次采访内容。

《60分钟》节目已有25年历史，收视率排美国前5位，每30秒广告超过60万美元，向以毫不留情的尖锐提问而闻名。1986年华莱士在北京专访过邓小平，并在上海采访过时任市长的江泽民。14年后重逢，他端给江泽民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刺”，如中国向美国提供非法政治献金传闻、李文和案、中国人权状况、一党执政、天安门风波、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宗教问题和“法轮功”等等。不过，这些问题并没有让江主席却步。相反，此次北戴河采访前，江主席没有让工作班子准备材料，明确指示不受时间和不受题目限制。采访以英语对话开始后，江泽民还对华莱士说：“你尽管放松，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访问中，江泽民既有对美国人民的良好问候，也有对美国霸权的机智反驳。他回忆起1943年做学生时参加反日示威活动的情形，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抗日歌曲《救亡歌》，表现出中

国人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而在谈到美国总统林肯时，他也用流利的英语背诵了林肯的葛地斯堡演说，肯定“民有、民享、民治”的理念，显示中国对民主价值的同样珍视。

9月4日傍晚，江泽民到达纽约，5日一早就和美国主要媒体负责人举行早餐会。他提出，在新千年和新世纪，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们希望美国新闻界人士多到中国去看看，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也希望美国传媒准确客观地报道中国。言谈中，是一种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强烈紧迫感。出席早餐会的新闻集团主席默多克说：“江泽民主席十分有勇气，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能够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然后任由编辑来剪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早餐会后评论说：“他在访问中非常出色，今天早上的表现也十分出色，这是重大的一步。”9月6日，在联合国举行的各国领导人午餐会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走到江泽民旁边，称赞他在电视专访节目中的表现。他说：“华莱士对我们都很刻薄啊，但在你面前提问时的声音却像小学生一样。”

在江泽民访问纽约前夕，9月2日，克林顿宣布暂缓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媒体普遍认为此举的大部分考虑是取得中国的谅解。而在江、克此次纽约峰会时，双方的会谈气氛也非常理性和温和。

有评论指出：“过去两国在台湾问题，在人权、宗教问题上有如斗鸡，一触及就怒目相视，但是，这回江、克两人在讨论‘法轮功’问题，宗教问题时，都能心平气和地听取对方解释，这种发展当然是过去几年双方不断交流的结果，也是中国领导人经过多次对美国的访问之后，所总结的经验与体会，谈谈何妨，不必经常剑拔弩张。”主动出击，多元交流，开放式沟通，建设性对话，中国的外交姿态更加自信，也更加有效。

毋庸讳言，今天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人好像拿着望远镜看美国，看到了很多被放大的好东西；美国人也同样拿着望远镜看中国，但他们经常把望远镜拿反了方向，看到的是一个渺小的中国，“妖魔化的中国”。也许每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尴尬，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只有持续的积极沟通才能帮助我们早日摆脱尴尬。

（摘自《南风窗》）

世说新语

有资金而没有知识，越拼搏，失败的可能性越高；有知识而没有资金，小小的付出都能有回报。

——李嘉诚

脸皮犹如鞋底，永远是厚比薄更有优势。

——作家丘灵

（摘自《荆门时报》）

匈牙利风雨十年路

布达佩斯人的日常生活相当于北京人的中下水平

□房 宁

匈牙利发生社会巨变已有十个年头。十年前，整个东欧以至苏联，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放弃了原来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他们认为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同以往巨大的社会变革不同，这次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甚至没有更多的惋惜，许多人怀着喜悦和憧憬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人们生活得怎样？今天的人们怎样看当年的巨变，怎样看这十年走过的道路？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此次访问匈牙利的主要目的。

社会巨变使匈牙利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收入和支出的水平看，匈牙利人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

根据匈牙利一些朋友的估计，匈牙利巨变后，大约 70% 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约 20% 的居民与过去基本持平，不足 10% 的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其中有少数大幅上升成为所谓的新贵族。1989 年后的 10 年间，匈牙利国民经济经历了大幅下降、起伏不定的恢复性上升的曲折反复，1997 年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为 1989 年的 90%，而 1998 年居民平均实际工资相当于 1989 年的 80%。当然，这些还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巨变使匈牙利从经济结构到人民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匈牙利，我接触得最多的是大学教授，他们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属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生活同样是今非昔比。10 年前他们收入颇丰，有房有车，周末、节假日经常驾车带上一家人到旅游风景区度假，还时常出国旅游。现在虽然车、房还在，但汽油每升价格涨到了合人民币 7 元以上，车简直没法开了。匈牙利的多数居民住房是私有的，多年来水、电、煤气等的价格持续上涨，现在水的价格是 10 年前的 100 倍，天然气价格是 10 年前的 80 倍，而平均名义工资只是当年的 6.5 倍。相比之下，我感觉布达佩斯人的日常生活相当于北京人的中下水平，如果仅从收入和支出的水平看，他们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

当然，教授们的生活还算不上真正窘迫，真正艰难度日的是那些普通劳动者，特别是退休的老年人。匈牙利原来全民享有全额医疗保

障，生病住院不仅全部医疗费用由国家提供，连住院期间的伙食也是免费的。现在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已大大削减。匈牙利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住的房挺好，穿的也颇为讲究——这些都是过去岁月的遗产，可就是囊中羞涩，缺现钱。在街头和旅游景点，我曾遇到穿着相当体面的老先生突然与我搭话：“先生，能给我一个美元吗？”我当时猜想这位老者几年前说不定是位受人尊重的教授或是位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此体面的老人竟然沦落到伸手乞讨的地步，让人痛心莫名。

人们常说，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青少年的乐园，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匈牙利却没有变成青年人的乐园。现在匈牙利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承受的压力不比老年人小。老年人一般都有房子，衣服也不缺，只要身体还好，退休金够吃饭的，生活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而青年人则不同，匈牙利年轻一代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就业问题。十年的经济、社会衰退与停滞，使百业萧条，许多青年人毕业即是失业。老一代人好歹都有栖身之地，而青年人失业就可能一无所有，甚至有流落街头之虞。

十年来，布达佩斯除了法国、加拿大等国投资建造的几座漂亮豪华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外，城市建设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城市面貌在变旧、褪色、老化。然而，无处不在的涂鸦，却成为布达佩斯一道新的“风

景线”。涂鸦表达着社会底层青年的无聊、无奈与愤怒的边缘化情绪。因此在西方国家，涂鸦也是不良社区最明显的符号。在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直至地铁、公交车辆的内外，涂鸦五颜六色，比比皆是。它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奇特的，它是追求时髦的新奇感与发泄不满的抗议性的混合物。涂鸦，也许是最能表现转轨时期匈牙利社会心态的那一种尴尬。

经过 10 年的巨变，在经济上，“私有化把大家都抢了”；在外交上，“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对于国内政治，“人民对现制度的评价一年不如一年”。

苏东巨变后，匈牙利虽未像俄罗斯等国那样搞什么“休克疗法”，但 10 年的大折腾，人们的思想、精神早已被搞“休克”了、麻木了。10 年前充满幻想的人时至今日对什么都不再抱有幻想了。俗话说得好：什么药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历史是条单行道，一旦选择，回头路是没有了！

从经济上看，匈牙利经历了 10 年的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时，原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面目全非，民族经济七零八落。当初，采用拍卖等方式处理国有财产被认为最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最少腐败。今天终于水落而石出。匈牙利目前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10 年私有

化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是大发其财。匈牙利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采矿业和加工业这两个生产部门中，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企业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完全占领该行业市场。

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目前，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拥有匈牙利 60.4% 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

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据我所知，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营销专业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如何使习惯于喝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现在，匈牙利人也许清醒多了。我夫人再见到当年的房东，她终于知道什么是穷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老太太咬牙切齿地说：“私有化把大家都抢了。”

在外交方面，过去匈牙利人不满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却被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只要天气晴

朗，北约的战机就在基地进行飞行训练，在布达佩斯的上空，战机吐出道道白烟，似乎时时在提醒人们北约的存在。提到此事，一位老教授激愤地说：“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

在国内政坛上，匈牙利最主要的三大政党 10 年来已经轮流上台，结果如何？匈牙利一份有影响的大报的一项调查说：“人民对现制度的评价一年不如一年，对未来的看法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先后参加执政的主要党派有：

民主论坛，是个相当松散的政党，主要由一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上台后，按西方模式改造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在 1994 年大选中下台。

社会党，由原来共产党中的一部分官员组成，他们并不想，也没有能力阻止私有化浪潮，只是想做一些调整。在私有化使政府财政税收大幅度减少的条件下，该党为了解决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只好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引起民众不满，在 1998 年大选中黯然下台。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于 1998 年 7 月上台执政，其骨干是 1989 年巨变时一些受老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影响的大学、研究生。这些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去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但人们一般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

其实对匈牙利老百姓来说，谁在台上都无所谓，反正对治理国家，

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民族和解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匈牙利人民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保持着矜持和尊严。

我也一直在想——是什么维系着转轨时期匈牙利社会的基本稳定？是什么维系着政治急剧变动中的国家的统一？是什么支撑着面对经济衰退的匈牙利人民，使其保持镇定、矜持和尊严？

是民族和解。所谓“民族和解”是国内对立的阶级与政治力量，基于民族认同，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而形成的政治妥协。刚刚卸任的前总统根茨·阿尔帕德先生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对实现匈牙利的民族和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曾经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并坐过牢的根茨，在匈牙利社会巨变中上台后，坚决顶住了极右翼进行社会清算的要求，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动乱和可能出现的新的一轮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匈牙利可以感受到人民对根茨广泛的尊重。

是文化积淀。匈牙利地处欧洲腹地，人杰地灵。匈牙利的田园牧歌孕育了许许多多优美传世的诗歌、音乐。欧洲古典主义音乐的三位大师中的两位——海顿和贝多芬都从如诗如画的匈牙利获得了大量的艺术灵感。自奥匈帝国以来，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战争、动荡和革命，但文明的传统基本没有中断。200 万人口的布达佩斯目前有 19 家

音乐厅 26 个专业交响乐团。虽然经济持续萧条，但每天晚上布达佩斯各家音乐厅门庭若市，人们率妻携子，盛装出席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在朋友们举办的舞会上我深深感受到了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匈牙利人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保持着矜持与尊严。

（摘自《环球时报》）

降低证券交易费用是趋势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日前说，证券交易费用的降低是个总的趋势，各个证券公司必须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高西庆认为，积极发展电子交易系统是一个基本发展方向，不及早重视这件事，到时就会不知所措，就不利于降低营业成本，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高西庆说，对证券业的兼并重组不能用行政的手段，只能通过市场的手段，这就要求各个证券公司必须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高西庆说，加入 WTO 以后，可能刚开始对中国证券业冲击会小一点，但影响会逐渐增大，特别表现在对人才和客户的争夺以及新产品的竞争上，当然还表现在软硬件的更新和知识的更新上。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何江涛文）